

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曹志耘 主编

□ 商務印書館

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曹志耘 主编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曹志耘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 - 7 - 100 - 09576 - 1

I. ①汉… II. ①曹… III. ①汉语方言—地理语言
学—研究 IV. ①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432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曹志耘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9576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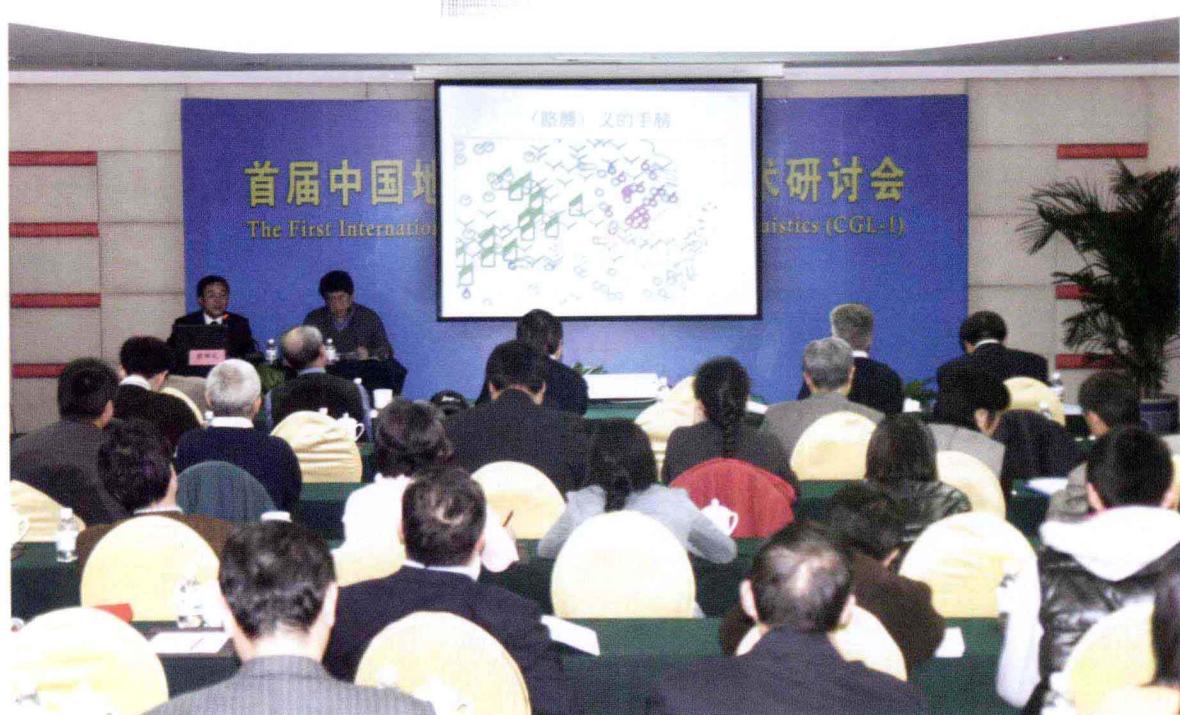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9 1/4 插页 2

定价:49.00 元



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1月21日)开幕式主席台



大会报告会场

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合影

西郊会议中心
Conference Center of Xijiao Hotel



目 录

语言地理学的研究目标是什么?	大西拓一郎	(1)
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	曹志耘	(13)
插入与包抄:语言地理分布的发展类型	洪惟仁	(23)
论词汇变化的“非连续性”		
——类音牵引和同音冲突二例	岩田礼	(31)
《方言》与中国地理语言学	张振兴	(43)
汉语方言地理学历史发展刍议	高晓虹	(51)
广东闽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刍议	甘于恩	(61)
日本地理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张勇生	(68)
俄罗斯语言学传统和汉语地理语言学		
..... О. И. Завьялова(奥尔加·扎维雅洛娃)		(78)
“支微入鱼”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解释		
——兼说古中原官话 ü [y]语音层的变异	刘勋宁	(84)
汉语方言卷舌音的地理共现与共变	张维佳	(93)
汉语方言匣母字读音的地理分布.....	夏俐萍	(104)
从地理分布看汉语方言的优势调型.....	刘晓海	(114)
汉语方言上声的全次浊分调现象.....	王莉宁	(129)
关中方言古知系合口字声母的读音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		
变化	张双庆、邢向东	(139)
从几组声母的演变看天津方言形成的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	王临惠	(151)
语言成分在湘语和赣语交界地区的传播		
——以“柱”为例	李永新	(160)
Glottogram 在地理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实例	李仲民	(167)
汉语方言“走”义和“跑”义的词形分布.....	赵日新	(176)
北方方言“蚯蚓”的对应词.....	太田斋	(183)
汉语亲属称谓的方言类型.....	胡士云	(191)
汉语方言“著”类持续标记的地理分布特点.....	罗自群	(202)

2 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山西、陕西沿黄河地区汉语方言类型特征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层次	
——以第三人称代词“他”为例	侯精一 (214)
汉语方言中的“俗词源”	
——以山西中部地区方言的“蝉、七星瓢虫”为例	刘 艳 (223)
湘东北及湘中部分地区的祖父称谓	孙益民 (233)
岭南土话“爷爷”的呼称形式考察	唐 伶 (244)
略谈吴语和官话的边界方言在地理上的形成和演变	
.....	Richard VanNess Simmons(史皓元) (253)
地理变化对方言分布格局的影响	
——以江苏邳州方言为例	苏晓青、许井岗 (265)
用 GIS 手段解读混合方言的成因	
——以灵石高地为例	沈 力、冯良珍、中野尚美 (275)
澎湖县语言地理研究	张屏生、李仲民、吕茗芬 (288)
浅谈扬雄《方言》中的语言层次问题	
——以“江淮”方言为例	松江崇 (295)
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掠影	插页

语言地理学的研究目标是什么？

大西拓一郎

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

一 引言

语言是人们相互交流的工具。但是，这一工具并不是全世界共通的。世界上有汉语、日语、英语等多种语言，国家不同，语言也有不同。而在同一系统的语言内部，还因地点的不同产生差异。这就是方言。语言地理学就是一门研究方言的差异在地理空间当中如何表现的学科。在这方面，语言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很明确。那么，语言地理学研究这些对象是为了什么？即语言地理学的研究目的是什么？我们参照日本的语言地理学以及方言学的历史来思考这个问题。

二 日本的语言地理学的开端

日本的现代化始于明治维新(1868年)之后。至此，江户幕府下以武士为中心的封建体制瓦解，外交上的锁国状态也被打破，日本与欧美诸国之间开始了积极交流。在这当中日本进行了义务教育及相关教科书的编撰。作为近代国家，这样的情势下就有必要设定全国通用的标准语言。于是，当时的文部省设置的国语调查委员会通过全国各地的自治体收集方言信息，出版了《音韵分布图》(1905,地图29张)与《口语法分布图》(1906,地图37张)。《口语法调查报告书》(1906)是《口语法分布图》的解说及其资料集，其结论有：“若将全国的语言按东西两侧分开的话，以现在的富山县、岐阜县、爱知县的东侧为界，东为东部方言，西为西部方言，日本语整体上可大致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与制定标准语的原定目标不同，以地图为基础客观地考察、把握日语的变异与地理空间的关系，这一语言地理学的基础就是在这时候确立的。

东条操的“方言区划论”就是以此成果为出发点的。国语调查委员会1908年实行了第二次全国调查，工作比第一次更精细。东条负责资料整理，但是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资料全部被烧毁(加藤1977)。

三 研究方言的目的

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民俗学的代表性学者柳田国男出版了《蜗牛考》(1930),作为研究方言的目的,他主张“方言周圈论”。《蜗牛考》考察了全国各地表示“蜗牛”的方言词及其分布。柳田通过通信调查,收集了日本全国的“蜗牛”的方言词形,以这些资料为据,将“蜗牛”的方言分为 Namekuji、Tsuburi、Katatsumuri、Maimai、Dedemushi 的几个系统,并发现其分布是以具有千年历史的中央地区——包括京都在内的“畿内”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开来。如此的分布反映了这些词形在历史上的中央地区发生的语言变化是依次放射出去的。方言的分布反映出了中央地区发生过的语言变化。换个角度说,通过了解方言的分布就可以重新构拟中央地区的历史。这就是“方言周圈论”,其理论魅力在于将时间与空间这两个不同的坐标轴(次元)联系了起来。

另一方面,东条操方言学的目的在于“方言区划论”。方言区划论将各地方言看作共时性的语言总体,而不是个别的要素。其目标是,通过记载各地方言,查出日语当中存在多少种方言,在地图上标明它们分布的范围,阐明方言间的系统关系。东条关于“方言区划论”的论文主要收入东条(1954)里。

四 方言周圈与对方言区划论

关于方言学的研究目的,柳田国男主张“方言周圈论”,东条操主张“方言区划论”,二者形成对立。

有人称柳田国男是日本方言学之父,东条操是日本方言学之母(但实际上他是男性)(真田 2004)。就日本方言学的研究目的,“父母”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理论交锋(东条 1954,柳田 1942)。简单地说,二者的区别在于是以分布为基础来解释各个词的历史(方言周圈论),还是通过大量的共时描写以弄清方言的系统(方言区划论)。

这里简单介绍日本的方言学的这两个学派研究的情况。

方言周圈论虽然很有魅力,但是柳田并没有说明实际应当收集什么样的资料,如何分析资料。因此《蜗牛考》虽然很有名,但是此后并没有进一步展开能超越“蜗牛”这一词的新研究。

而关于方言区划论,则有日本方言研究会(1964)编辑的书,此书的出版引导整个学界一起开展更深入的研究。但是也可以说,方言区划论的研究在此书的出版之后就告终结了。其后方言区划论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新的开拓。原因在于其存在着与方言周圈论相同的问题。首先,对如何划方言界线的具体方法没有明确的说法。根据何种语言要素来划分方言区才合适呢?在地图上如何划出界线呢?关于这些问题,始终停留于探索阶段,停留于无休无止的议论中,毫无结论。另外,方言作为在分区的基础上设定

的语言总体,应该如何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关于这一点也没有具体的方案出炉。结果,研究手法不明确,关于如何根据具体的资料来分析才能得到可再现的研究成果,也不明确,问题在于这种做法只是像高手偶然露一手而已,缺乏科学性。

方言周圈论也好,方言区划论也好,因为其研究走进了死胡同,要实现日本方言学研究的目标,必须拿出科学的研究方法来。

五 作为历史语言学的语言地理学

可以说,日本的方言学进入了“死胡同”,打开局面的是柴田武的语言地理学。语言地理学这一用语在此前的日本方言学中已为人所知,多扎的《语言地理学》也早就翻译出版了(多扎 1938)。但是,除了“蜗牛”之外,很少应用于对具体方言分布的研究。对此,柴田与德川宗贤、贺登崧、马濑良雄三位一起到新潟县丝鱼川进行田野调查。他们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展开了具体的学术活动,发表了多篇论文(有的在学会上口头发表)。其后柴田武(1969)《语言地理学的方法》一书出版面世。

柴田(1969)对学界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以下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明确了语言地理学的研究目的。以下的说法决定了日本语言地理学的方向。

“语言地理学是语言史的方法之一。”(p. 11)

“语言地理学是语言史学的一个方法。”(p. 189)

这也就明确了研究的目的,也就是说,只研究方言的地理分布并不等于语言地理学,依据方言分布来研究语言历史,这才是语言地理学。

第二,明确了研究其历史的方法。追溯历史要抓住以下八项要点(括号内是译者的注解):

- (1) 某一个词(表某一词义的诸种词形)的地理分布
 - A 邻接分布原则 B 周边分布原则
- (2) 不同年龄层次的地理分布
- (3) 该词与其他词在地理分布上的互动
- (4) 理解词(即能理解其意义但是自己不说的词形)的地理分布
- (5) 事、物(即该词形的所指)的地理分布
- (6) 被调查人的直觉性判断报告(内省报告)的地理分布
 - A 新旧的判断 B 词源解释
- (7) 不同年龄层次的差异
- (8) 语言(语音)形式本身的特征(变化的普遍性)

其中尤其受重视的是(1)基于地理分布的方法,而且其手段已实现了现代的模式化。A 的“邻接分布原则”中,如果历史上,呈 a—b—c 状的词形分布在二维空间上排列

的话,其演变过程只能假设为“ $a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c$ ”或者“ $c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a$ ”中的一种。而且,如果 a 的分布地点系该地区的中心区域,则可假设其历史演变过程是“ $c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a$ ”。这一观点与柳田的方言周圈论类似,但是与之相当的是 B“周边分布原则”。亦即,词形在二维空间上的排列呈 $a-b-a$ 状分布,当词形 b 的分布地点是该地区的文化中心地时,那么其历史演变过程则是“ $a \rightarrow b$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柳田的方言周圈论相对应的“周边分布原则”是以“邻接分布原则”为前提的。《语言地理学的方法》发现以下可能性:即使没有 $a-b-a$ 型的周圈分布,也能推测演变的历史。

试以下例说明。新潟县丝鱼川地区的“肩車”(Kataguruma,意为“(孩子)骑在脖子上”)的分布及由此进行的历史推断是有名的例子,经常被引用。(图 1)从图中,我们可以把该地区中心部的丝鱼川市的“肩車”的演变历史过程解释为 Tenguruma→Shishikaka→Kakkarakatsu→Kattendondon→Ochigos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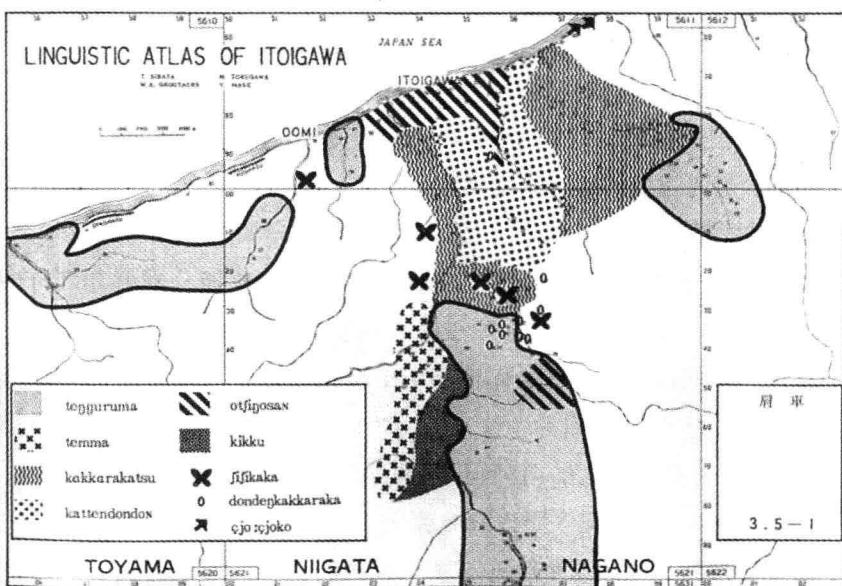


图 1 新潟县丝鱼川地区的“肩車”

六 语言地理学的盛行

柴田武的《语言地理学的方法》的出版无疑是语言地理学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这部书的核心内容是丝鱼川的方言调查成果,在其基础上又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德川(1993)以及贺登崧(1976)是以丝鱼川调查的共同研究成果编辑起来的单行本。其中的论文受到了高度评价,为大家接受。

丝鱼川的语言地理学研究能取得成功,贺登崧的功绩之大是众所周知的。语言地

理学中语言地图的绘制是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技术。词形整理的方式、用记号绘制地图的具体方法等系贺登崧引进的。这些往往都隐藏在学术论文的后面，不容易看到，但这一例子说明，基础技法的导入对于学术的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丝鱼川的调查及在其基础上展开的研究，通过提出具体的研究方法，促进了各地语言地理学调查的实施。同是丝鱼川的共同研究者马瀬良雄以长野县为对象展开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众多论文后来收录在马瀬(1992)中。与此同时，国立国语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日本语言地图》(1966—1974，全6卷)。这些成果让我们扩大视野来观察各地区的语言地图在全国范围内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自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的语言地理学达到了鼎盛期。发表了约400册语言地图集，合计约30000幅语言地图(图2)。还发表了800多种学术论著。后来，从1998年至2006年，国立国语研究所发表了《方言语法全国地图》(全6卷)。因此而引人注目的是，对于语法变化以及方言分布之间的关系，在以“语法化”为代表的理论解释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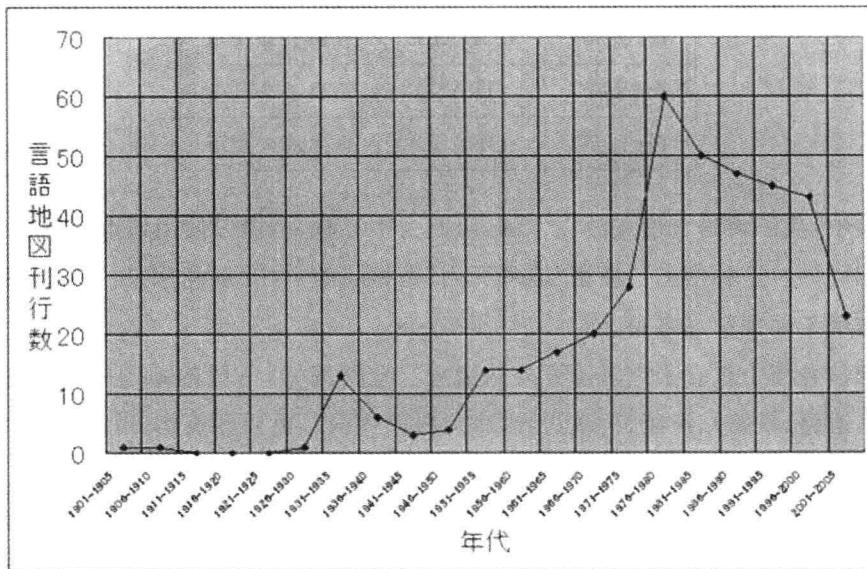


图2 各个年代语言地图的出版情况

七 方言信息也是地理信息

对语言地理学而言，语言地图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在过去，手工绘制语言地图是理所当然的。而到了20世纪末，伴随着电脑性能的提高，用电脑绘制地图已经普及。

语言地图绘制的电脑化过程当中，专用软件的开发也是日新月异。《方言语法全国地图》从第5卷起，也开始应用了绘图软件编制。选择这样的工具手段，是因为要在形式确定的空白地图上标示出每个方言形式的位置，并印刷出版时，专用的绘图软件是最

佳选择。

在地图上处理方言的分布时,也会考虑到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

将语言作为信息来处理时,其基本结构是语义与词形的组合。但是,现实中,语言是人们使用的,就必然会附加在哪里使用的有关“地点”的信息。方言就反映出了这里指定的因使用“地点”不同而产生的语言信息的差异。比方说,我们可归纳出下表。

语言信息		使用地点
语义	语形	
扔(丢弃)	AGERU	宫城县仙台市
扔(丢弃)	ORU	石川县金沢市
扔(丢弃)	OKARU	岐阜县岐阜市
扔(丢弃)	OORU	福井县福井市
扔(丢弃)	UCHARU	長野县诹访市
扔(丢弃)	OKASU	奈良县奈良市
扔(丢弃)	OKASU	大阪府大阪市

上表中,我们将语言信息放在左侧,以此为中心轴,也能以使用地点为中心轴来看,情况是相同的。这种信息与所谓“地理行列”是相同的,也就是说,附加了地点信息的语言信息也属于地理信息之一。^①

地理信息当中包含了许多语言外的信息。众所周知,一般的地图中所包含的信息有:交通(道路、铁路)、河流、行政边界(市町村的界线)、重要建筑物(市政府厅、邮局、消防局),以等高线表示的地形等等。另外,还有地表上看不见的自来水管道以及瓦斯,以及根据国情调查(census)所得的各个地区的人口状况等,是作为能确定各个地点的信息而处理的,所以也归入地理信息。GIS正是综合处理上述各种各样的地理信息的系统。因为语言信息也可以包含在地理信息中,因此能通过GIS把方言分布与地图上的其他地理信息互相照应、对照。这意味着,以前作为语言地图,只注重固定的空白地图中方言分布的位置关系,现在可以进一步拓宽视野了。

八 分布是否反映历史?

(1) 对自己父亲的敬语分布

日语语法中有“敬语”一项。但是,敬语的使用方法因方言而异。提到“敬语”这一名称,人们往往认为是用于表达对说话对象或句法结构上的主体的“敬意”。其实,“敬

语”除了表示“敬意”之外,还可用于表示与说话对象或句子主体的“距离”。在这点上,近年来以 politeness 的范畴来研究敬语的思路已经逐渐成为主流。

下面我们看看表示敬语因方言而异的分布。在问自己的父亲“今日は家に居るか。”(kyou wa uchini iru ka “今天在家里吗?”)的时候,动词“居る”(iru,“在”)以何种形式出现。

这一调查对象是家庭内的敬语使用方式。在这点上,我们可以认为分布情况与家庭形态的地域差异有关。于是我们运用国情调查数据,将敬语与家庭人口数的关系做了进一步调查。

调查显示,对自己父亲使用敬语的多出现于家庭人口数少的地区。在九州,特别是南部地区这一现象尤为显著,在东北地区,一般家庭人口数较多,但是其中家庭人口少的地区就使用敬语了。

如认为敬语是用于表达对说话对象的敬意的,上述的结果则难以理解。家庭人口数越多家庭规模就越大,这大多应该是数世同堂的情况。因此,人们会推测,敬语是用于表达对同居长辈的敬意的。

但是还要考虑到如下一点,即如前文所说,敬语的功能不只是表达敬意,也用于表达与对方(或句子主体)的“距离”。在此我们考察的是说话者与其父亲之间的距离。在家庭人口数少的地区,数世同堂的现象比较少见。实际上,在日本西部地区,传统上,父母与儿女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就会分居,各自营生。这与日本东部的同族集团制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的社会是以“家”为中心构成的,而西部则是以地区的同龄集团为中心形成年龄阶梯制社会。^②这在民俗学中很早就有人提及(宫本 1960)。体现在数值上就是,日本东部是家庭人口数多的大家族制,而西部则是家庭人口数少的小家族制。这种实行小家族制的年龄阶梯制社会当中亲人内部之间的距离在语言形式上就表现为“敬语”的使用频率,这也反映于地图上的分布。在属西部地区的九州南部,继承家业的不是长子而是幼子,实行的是幼子继承制,这导致产生小家族制。属东部地区的东北以大家族制为主,但在周围都是大家族制的环境中也出现采用小家族制的地区,在这种地区敬语则还是用来表示“距离”。

从上述各点可见,语言地图所表示的方言分布也反映了各个地域社会的形态,而不仅是表示以往语言地理学所聚焦的语言历史。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拓宽研究的视野,而不只拘泥于语言史。

(2) 经年比较(对不同时点的分布作比较)

“方言周圈论”反映了中央地区的语言变化,新的语言形式以中央地区为中心依次放射开来,形成涟漪状的方言分布。“邻接分布原则”也一样,中心地区的语言变化 $c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a$ 逐渐向外围扩散,在地图上反映为 $a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c$ 的分布。

若此为事实,则实际地在同一地区隔一定的时间段以同样方法进行调查的话,即可观察到分布扩散的情况。“方言周圈论”与“邻接分布原则”都是以特定时点上的分布为基础来推测历史的假说。而假说究竟能否成立则必须在实际时间当中验证。但这需要间隔一定的时间连续进行研究,但所需的时间过于长,以至于迄今为止无人验证过。在这一点上,“方言周圈论”与“邻接分布原则”的理论一直是作为假说传承下来的。

日本的语言地理学的起步相对比较早,从导入可重复验证的科学手段的丝鱼川调查以及《日本语言地图》的出版以来已过了 50 载的岁月,而从日本的语言地理学最繁盛的 20 世纪 70—80 年代至今亦经过了 30—40 年。在这期间,语言地图的调查对象也更替了 1—2 代人。我们可以想象到语言变化就在这样的新旧更替中发生,因此,调查现阶段的分布,并将其结果与过去的分布作比较,这样,要对不同时点的分布作比较就有可能了,并有望观察到分布的扩散现象。

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方言演变的背景,日本社会经历了经济高度成长期,随着向中央靠拢的意识的加强与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以电视为中心的媒体普及,在全国各地深入发展的共同语化。考虑到这一事实,我们感到方言分布面临着被清一色的通用语取而代之的危机。

然而,在这样的形势下,地方的方言社会中也产生了新的语言变化,并非所有的变化都向共同语化的方向发展的。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以来就有许多报告提到这一点。(井上、罐水 2002)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方言变化都卷入了共同语化的潮流,在经济高度成长的现代化之前就已存在的语言变化至今依然有生命力。“共同语化”正是有用共同语能够表达的对象才成立的,共同语里没有的概念、事物或语法范畴,原本就应该自外于共同语而存在的。

考虑到上述情况,如果我们对不与共同语化潮流合拍的对象或者可能发生新的语言变化的项目多加关注的话,就可能通过历时比较,对已知的分布理论“方言周圈论”和“邻接分布原则”进行验证。

在富山县的庄川流域,已得到世界遗产的登录的秘境五箇山,其深山地区与中下游的平原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方言差异,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对这一地区的语言地理学研究就很兴盛。(真田 1976,1979)

笔者等人对同一区域也进行了共同调查,这里将 40 年前的分布与现今的分布图重叠并进行的比较结果作一简单介绍。其中,在确定同一地点在不同地图上的位置时及处理不同地图之间投影法的差异方面,GIS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Mukago”(むかご,图 3,见下)是山药的叶子根部结出的小果实(“珠芽”,可食用),与土中的块茎不同,一旦落到地上就会长出新个体。这种果实在使用共同语的社团中不多见,名称叫做“Mukago”。然而,知道这一词指什么东西的人就很少了。而在

地图所示的地区，人们经常食用，是很熟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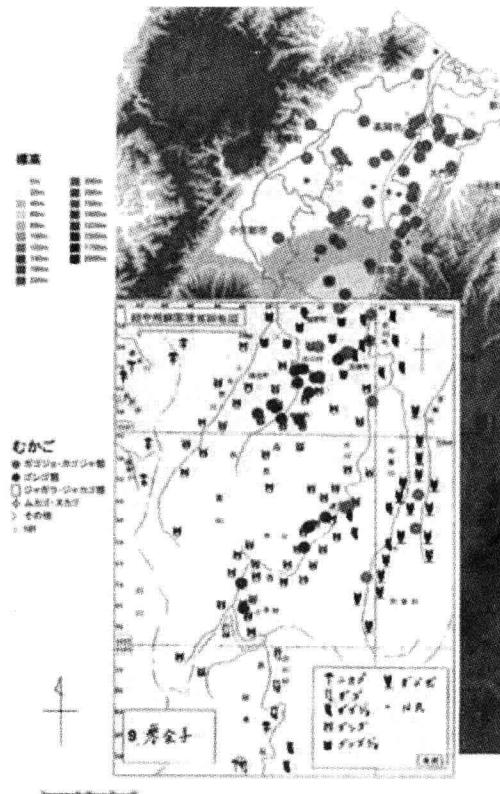


图3 “Mukago”的经年比较

“Gennosyouko”(現の証拠, 图4, 见下)是止泻、清热的野生药草, 在有些地方是普通的植物, 用作药草。但是作为实际的植物, 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鲜为人知, 很多人即便对草名有所耳闻, 也想象不出到底是怎样的药草。但是, 当地人对这种植物是比较熟悉的, 笔者在调查时听说, 尤其在深山区域人们还把它当药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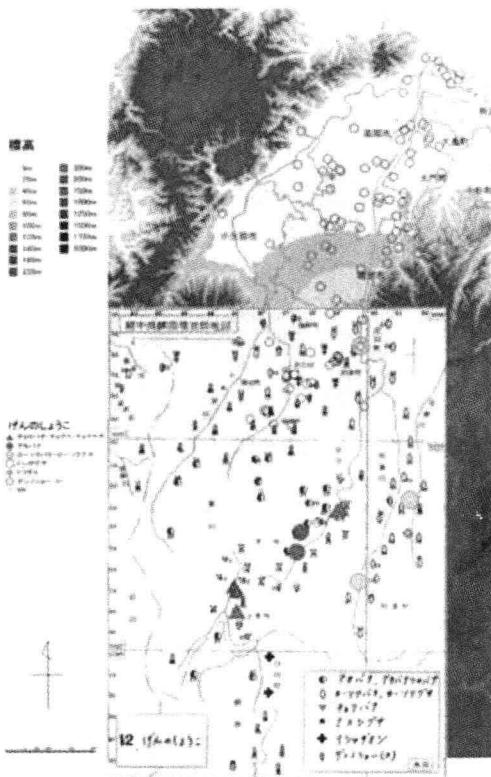


图4 “Gennosyouko”的经年比较

一般认为，在该区域，新的词形分布是从沿海地区以及北部的平原（庄川中下游）开始向南侧的深山地区扩散的。学者们一直以来是根据这一思路对方言分布进行解释的。假如这一假说是正确的话，我们可以期待，沿海和平原地区的词形在经过 40 年的岁月后，其分布会向南部扩散。然而，从这些图中我们可以看出，40 年间方言的分布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虽说现阶段还正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但是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方言周围论”以及“邻接分布原则”所推测的渐进式分布扩散现象。

虽然对于方言事实的收集还不够充分，但目前的分析结果让我们开始怀疑现存理论所推想的分布扩散是否真的存在。在日本的语言地理学研究中，运用邻接分布原则时，人们经常说“词语是顺着地面爬行传播的”。这种说法则以地理空间上的连续性与语言现象的传播之间存在着平行性为前提。但是对人们之间的交流活动（译按：指词语借以传播的手段）作如此解释以支持上述命题，这一做法是否妥当，还有待探讨。

当今，在现存理论的假说还未得到验证时，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把语言地理学定位为语言史研究的方法之一是否正确，以此对理论基础加以再认识，迎来研究的新局面。